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唐 芸 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关键词:清代唐宋诗之争;文学史观;诗人主体;温柔敦厚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097-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10

清人对明代诗学密切关注,不仅仅是新朝对旧朝“以史为鉴”的总结,更是因为文学史传统被明代大肆洗刷斧藻,特别是明代复古派将宋诗划出文学史,导致了诗歌史断层,却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接续问题,这让文化精神更趋近于宋代的清人感到焦虑。清人需要厘清被明人带偏了的诗学传统。唐宋诗之争的发生和解决,便是集中体现。

一、清代唐宋诗之争的结穴

清代唐宋诗之争在进入之初,便体现了与杜诗、《沧浪诗话》、宋诗、竟陵派等有关的缠绕不清的话题,这些话题构成了整个论争的结穴。

(一)论争结穴之一:杜诗

吴乔《围炉诗话》所言“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非直纪事之谓也”^{[1]562},在清代杜诗学中极具代表性,他对杜甫“诗史”的定位已经不再局限于“以诗证史”,而是因为与圣人一致的是非表达。按此思路,传统诗学概念在杜诗中应是完美的体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杜甫的诗歌成就,诗体发展并不平衡,绝句的成就明显逊于其他各体。在辨体发展进入学术化的明清时代,杜诗究竟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论其价值,还是各体分论?按照传统的世运划分,杜甫所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其诗歌成熟期,当是乱世,那么依照严格的时运与诗运关系,杜诗当属于变风变雅,无法进入第一义序列,与其经典地位不符;杜诗中大量铺陈,导致被认为是《雅》的后裔,而非严格的风人之旨,呈现出与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错位;根据穷而后工的理论,杜诗之工,是否因为其处穷?那杜甫个人

收稿日期:2023-03-13

作者简介:唐芸芸(1982—),女,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诗学。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与逻辑进程”(17XZW019)。

的才能又将何至?杜甫提倡转益多师,终于造就其“综前代”的价值地位。但在“综”之中必定有所变化,这些“变化”的价值该如何评价?而后人是否可学其“变”?与《诗经》相比,杜诗本来应该是属于“流”,但杜诗又是中晚唐、宋诗的源头,源流关系究竟为何?最终落实到现实诗坛,究竟应该怎么学杜?

以上诸条关涉了诗人主体精神的表达、辨体、时运与诗运、温柔敦厚、穷而后工、变、源流、师古等基本问题。那么,解决杜诗与传统诗学观念的龃龉,就必须重释这些基本的诗学概念。惟其如此,杜诗才能够在诗坛上真正获得与六经并立的地位。

(二) 论争结穴之二:严羽《沧浪诗话》

清代主流诗坛认为,严羽推举盛唐,实为明七子诗学之开端。如钱谦益、冯班等明确反对七子者,即对《沧浪诗话》表示否定,冯班还作《严氏纠谬》进行完整系统的讨论。但其实处于唐宋诗之争中的人们对于《沧浪诗话》存在很多理解上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混淆了明七子的第一义与严羽的第一义。

明七子所求的第一义,是从诗体的角度出发,每一种诗体都有其第一义,如五古则是汉魏,七古与律诗才是盛唐。严格的辨体思想,是明七子求第一义的学理基础。严羽的第一义,则是从兴趣和无迹的角度而言的,第一义指的是汉魏与晋、盛唐诗。由于考虑到汉魏诗“不假悟”,不易学,从而以盛唐为上。他主张的是包含各体的整个盛唐诗,而不是如明七子般有诗体之别。所以,如果说明七子沿袭了严羽,只能说学习了第一义的思路。而作诗当学最上一级,也并不是严羽的发明,而是一个传统的认知。所以,将明七子的错误归咎于严羽是不对的。

第二,对严羽论宋诗的误解。

严羽《沧浪诗话》为宋诗找出了三大缺点,即“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26}。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直接从才学、议论等来判断是否有宋诗因素。于是,为宋诗张目的人们,都试图在《诗三百》或盛唐诗中寻找议论、叙述、才学的影子,正是围绕着严羽定下的这些宋诗特征的方向,即使叶燮也不例外^{[3]416}。

事实上,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这只是严羽对宋诗表征的描述,他所说的“非关书”,“关”为“门闾”,即“为书所关”之意^[4],指的是不被书所缚,而不是将才学统统舍去。他反对的并不是文字、才学、议论的有无,而是文字、才学、议论的呈现,即宋人对文字、才学、议论的运用用力过猛,露出了作诗痕迹,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盛唐气象相悖。

进一步的,黄庭坚以文字为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连押韵都要有来处,这些本来正是最直接地体现了今人与传统的关联,而严羽却说他是“自出己意以为诗”^{[2]26},因为“无兴致”且破碎有痕迹。所以,在严羽诗学中,与古人合与否,并不在于字句,而是在于兴趣和无迹。而明七子却恰恰用心于字句间与古人点滴求合,这是明七子在师古问题上与严羽的根本区别。

第三,至于渔洋声称承继“羚羊挂角,无迹可求”^[5],实则是渔洋及后人的误解。

这一点周裕锴论文《〈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已经明确指出:“第一义之悟”和“透彻之悟”是对同一等级诗歌的不同表述,并非各有格调、神韵之二义;“兴趣”的意思是“感兴的趣味”,与神韵、意境无关,提倡“惟在兴趣”与推崇李杜诗本无矛盾;“羚羊挂角”“空中之音”等禅语是关于诗歌语言文字在表达意义的澄明性方面的隐喻,并非提倡冲淡空灵^[4]。严羽的“盛唐兴趣”,包括李白的豪放飘逸和杜甫的沉郁顿挫,显然这二者都不是“神韵”的理想典范。王士禛自称承袭严羽,宋荦等时人也承认王士禛承袭严羽,说明在清代对《沧浪诗话》的接受其实含有极大的误会。

严羽诗学中更重要的诗学精华,其实是“兴趣”,兴趣,就是在《诗评》中评价李白诗歌时说的“感兴的趣味”,学者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4]。严羽认为,无论是李白的豪放,还是杜甫的沉郁,抑或王维的疏朗,都是出于兴趣。宋诗“无兴致”,便是缺乏兴趣,他对师古的讨论,也是围绕着兴趣进行的,即与诗

人主体的关联性,这是明七子论诗最薄弱之处。明七子只是看到严羽推崇盛唐,并没有具体探索严羽推崇的盛唐趣味究竟为何。公安派、竟陵派自然也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纠偏明七子失败了。严羽以兴趣为性灵与师古的融合提供了典范。

关于严羽对唐宋诗的具体认知,可以再讨论,但这个将性灵与师古融合的思路,确实值得称道。更为重要的是,严羽的“兴趣”与陈子昂的“兴寄”一脉相承,盛唐诗国高潮的成就,莫不在于“兴寄”。盛唐诗人并没有给自己刻意营造一种特殊的生态,而是融入当时真实的生存氛围中,展现他们对时空的把握,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感触,或伟大的抱负,或衿小的心思,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产生共情,诗之至莫过于此。

清代王士禛强调“伫兴”以相承,这才是他真正承继严羽的地方。而袁枚将起兴的范围最大化为人伦日常,并强调“趣”,重拾为“兴趣”。可惜的是,袁枚对严羽的理解,也是充满误会。

(三)论争结穴之三:宋诗

唐宋诗之争在宋诗的问题上,也是极为复杂:钱谦益以苏轼、陆游为宋诗代表,吴之振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叶燮主张苏轼而排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而袁枚主张杨万里,排斥黄庭坚。即使都是主张黄庭坚,王士禛认为其并不出于杜甫,而翁方纲却正是以杜甫、黄庭坚的脉络联系唐宋诗。其中还存在理论论述层面深浅用心的区别。

这么看来,宗唐宗宋的问题,并不是两派高举大旗呐喊示威便可以赢得支持的力量。明复古派由一句“宋无诗”,便抹杀了宋诗的价值。李梦阳《缶音序》明确说明了唐诗具备而宋诗缺乏的因素:被管弦;其声悠扬,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香色流动;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其气柔厚;感触突发;言切而不迫;流动情思;不直作理语,而理在其中;又宋人“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批判宋人对“法”的过分讲求等^{[6]447}。概括起来,即人们常说的“唐诗蕴藉,宋诗发露”,具体为性情、学问、赋、比兴、切实、兴致、辨体传统诗学概念。

如此便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第一,宋诗果真如此么?第二,即使宋诗果真如此,那具有这些特征的诗歌就真的无法进入文学史么?

这里要注意的是,既然严羽是以苏、黄为宋诗代表的,明七子也是如此。那为何清人还要积极讨论谁为宋诗代表呢?明人只是从理论上下了“宋人主理不主调”的论断,并没有对宋诗史进行过如唐诗般细致深入的反观和思考。而清代总体的学术风气,却要求人们要像谈论唐诗一样研究宋诗。尽管在清初乃至中前期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于唐宋诗用功并不平衡的状态,但从钱谦益提倡苏轼、陆游,到吴之振的苏轼、黄庭坚,到王士禛的黄庭坚,叶燮的苏轼,再到沈德潜的苏轼、陆游,翁方纲的苏轼、黄庭坚,这期间对宋诗审美特征的考量,是一个非常细致甚至反复的过程。唐诗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作为参考存在的。而宋诗价值,则取决于诗学家对宋诗的完整梳理和更细致的辨体工夫,以及体现文学史视域的整体观。这个讨论本身就昭示了清人纠结的态度:宋诗果真如此么?

既然是价值判断,就需要与价值判断的统系相关联,所以关于宋诗的评价,便可以置换为对“比兴、理、切、议论、学问”等核心观念的评价。即“无调,理,直陈,言切,艰涩”的宋诗,是否符合传统诗学价值评价体系。所以,唐宋诗之争体现的不仅仅是清人对明人的反思,更是对整个中国诗学的反思。于是对这些诗学概念的论辩便构成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实际内核。人们对这些核心概念作出清晰的阐释,便能够重新确立唐诗和宋诗的文学史地位与价值,也能够完成对唐宋诗关系乃至整个诗史的重新建构。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学唐还是学宋的师古主张。

于是,诗学家们又着重对传统诗学价值评价体系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无调,理,直陈,言切,艰涩”的宋诗,于唐诗之“变”的关系讨论,自然是应有之义;而宋诗不符合温柔敦厚,与之相关的又牵连出穷而后工、时运与诗运、赋比兴的价值,最终关联到“诗言志”的核心观念。这当然也与明末清

初对个体责任的强调有关。

进一步的,宋诗对唐诗,是变还是继承?即究竟是承认宋诗中“似唐”的价值,还是“变唐”的价值?这里就关涉到是否承认“变”的价值。如果承认宋诗为唐诗之变有价值,那么主张学宋诗,究竟是学其“变”,还是学其不“变”?明七子主张五古以汉魏为尊,七古和律诗以盛唐为尊,这是典型的“第一义”的思路。那么,高举宋诗可学的诗学家们,如何认识宋诗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宋诗是可以与唐诗并立的第一义,还是作为唐诗的支脉存在?那就涉及到是否坚持从诗歌史的“第一义”入手的问题。如果默认可以不从第一义入手,那么,其他时代,如中唐、晚唐,甚至六朝,又如何论述其存在于文学史却又被划出师古范围的原因呢?更重要的是,《诗经》的经典地位,以及在解经中确立下来的诗教观念是如此牢固,人们如何解释为什么不直接学《诗经》?所以,清人在论述中,眼光早已超越或唐或宋,如叶燮将诗歌史分为《诗经》的“系乎时”和后《诗经》的“系乎诗”两个阶段,分别论述;又如沈德潜致力于推源溯流,认定唐诗为古诗之“流”等。

可见,清代唐宋诗之争,包含了诗歌本质、诗歌批评原则、诗歌审美特征等重要理论问题。从讨论宋诗的价值,深入到讨论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拟议与变化、学问、赋比兴、蕴藉等传统诗学概念,才是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实际内核。

(四)论争结穴之四:竟陵派

明末清初的竟陵派,其地位很是尴尬:一方面为反对摹拟,而与公安派一样主张抒写性灵;但又将性灵归于“深幽孤峭”的晚唐一脉,似乎与七子有同样的“学唐”主张,创作上也陷入一种“格调”。竟陵派与其严明申讨的明七子一样,都被冠上“无性情”的缺点。所以无论是明七子的接棒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批评竟陵派。

但明明竟陵派是标举性情的,为何受讽?这就激发清人不仅仅满足于性情的提倡,而更应重视讨论究竟应该如何表现性情,性情与人品的关系是否对等,性情与传统的关联应该如何等。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性情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与道德有关,还是与日常生活有关,或者与学问有关?诗人的主体究竟如何体现?进一步的,诗歌这种体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由?

清人多将竟陵派放置于时运关系中,即乱世之音。而时运与诗运的关系是否应该被重提并加以规范?属于乱世之音的竟陵派显然不符合温柔敦厚,那么,明七子是否符合温柔敦厚?温柔敦厚的内涵是否还可以继续涵盖后代之诗?温柔敦厚对唐宋诗的束缚,在讨论日多的宋诗中,将如何应对?这关系到传统诗教观的威严,也关系到清初人们恢复传统、经世致用的基本信心。与此有关的,并不属于传统核心诗学概念,但与时运诗运、温柔敦厚关联紧密的穷而后工的观念,究竟该如何评价和使用?

二、与文学史观及诗人主体有关的传统诗学概念之逻辑建构

从具体的诗学主张上考虑,唐宋诗之争确实是一个师法策略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或唐或宋自然是偏执的,而似乎所谓折中唐宋才是佳选。但折中唐宋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师法对象而已。或学唐、或学宋、或折中唐宋、或跳出唐宋学《诗三百》,都只是对师法对象的陈述,仍然没有触及明七子诗学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文学史传统的接续。唐宋诗之争是一个专题研究,而不是诗歌史研究,所以,重点是考察这个专题的发生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按照时间进行的,但决不是罗列在这个时间内的所有清人的所有诗学观念。如果研究中只是将唐宋诗之争视为师法策略的论争,在思考和书写中就很难摆脱资料罗列。那么,究竟在师法策略的背后,关涉到哪些诗学主张?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又如何呢?

师古问题中,师法策略与审美理想本就存在着离合的关系。审美理想是出于对文学史的思考,或出于自身的审美趣味认定的第一义的诗歌状态;而师古的具体策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师法策

略必须与审美理想相合,就是学诗要从第一义入手,明七子便是沿袭此理;另一类是认为审美理想并不容易学习,而当从易学习的典范处入手,然后再接近审美理想,比如从近体规范性极强的中唐入手,进而接近盛唐。这样的师法策略与审美理想是分开的。如清代冯班,审美理想是杜甫,但师法策略是主张从学杜有得的李商隐入。这也是出于对具体学习的难易程度及效果的考量。所以,唐宋诗之争中的或唐或宋或折中,即使是相同的主张,也存在着师法策略与审美理想是否相合,即是否从第一义入手的区别。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审美理想的问题,与之紧密关联的,便是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所指涉的,除了对唐宋诗的美学特征进行价值判断外,还有正变、源流等观念。关于正变,关联紧密的便是传统的时运与诗运关系。因为明七子主张盛唐与建安诗,从传统的时运诗运关系看,盛唐诗符合正风,建安诗则应属于变风。可见明七子实则并未过多考虑时运与诗运的问题。他们主张的是“诗体正变论”。所以,从辨体的角度,清人其实无法反驳明人所指出的大部分诗体正变的事实。为与明七子区别,清人就要转换“正变”的内容,即否认诗体正变成为文学史观和师古的唯一依据。所以从钱谦益开始便恢复以传统的时运与诗运关系论诗。又由于这个论断自身所带的机械性,无法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叶燮便将文学史分成《诗经》时代和后《诗经》时代,前者以时运诗运关系论,后者则以诗风论正变。在唐宋诗之争中,“变”虽然是一个核心词汇,但值得关注的,除了诗学家对“变”的价值判断外,还有“变”的载体究竟为何。

而清人在解决师古问题的过程中,除了对第一义思路或坚持或背离外,还出现了一个观念,便是“性之所近”。如黄与坚:“盖诗中原无畛域,学者但就其资所近,学所便力为之,自当超诣及古。人人性分各有诗,正不必于故纸见蹊径。”^{[7]60}从逻辑的层面说,“性之所近”的师古主张实际上是最科学有效的:既承认文学史事实,也承认文学史中经典的价值,同时并不讳言规范化的师古捷径,更重要的是,“性之所近”既尊重了“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不违背义理之性,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去除统一的师法策略带来的模式化,大大提升了诗歌表现的自由度。

“性之所近”提示了清代唐宋诗之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与诗人主体有关。这是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歌言志,则诗如其人。不但在内容上要求诗与人相合,在诗歌的整体表达上所呈现的倾向,都需要与人之气质相合。甚至是否作诗,是否有诗性,也与人之性相合。这样,诗歌和诗人主体都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那么在师古的问题上,显然也要遵循“性之所近”。于是问题就再次复杂化,在与审美理想不合的师古途径中,又分化出来两类:一类是从现实的师法策略的角度,师古要学习规范性强的作品,如大历诗风;另一类是无论师古对象是否符合师法策略,师古仅从作诗言志取“性之所近”的角度进行考虑。

中国古代的诗人主体长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要求诗歌表现诗人主体的情感、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又由于诗与政通的思想,及丰厚的文学史,对诗人的情感、意识和价值的内容甚至表现方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历代诗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处理,要么如唐人在题材上进行扩宽,在诗律上进行尝试和规范,要么如宋人将题材精细化,表现方式也开拓到极致。但到了明代,诗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都无法再开拓,创作出现了严重制约,最终完全依附文学史的观念占了主流,即复古派试图以格调的点滴求似来承袭大传统。

在清初,人们仍然面临着与明代同样的问题:诗人主体与文学史传统压力的关系,今人如何与古人相处。具体到诗歌本身,便是格调与性情的矛盾,人们都承认“格调”为古,但今人之性情如何在古人建立的格调中呈现,二者出现矛盾。师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格调”?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呈现“性情”?如果理论上不解决这个问题,完全由连续不断的诗歌实践来进行试探,诗歌发展之路将会迂回曲折。

清人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时则承认:格调与性情,都与古人有关。格调与古相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性情也是与古相通的,“诗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犹古人之性情也”^{[8]67}。或问:明七子之诗“无

性情”,不正是缘于他们认定古人之情与今人之情相同或相通吗?这与冯班所论有何区别呢?

持论“今人之性情,犹古人之性情”的清人,实则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看古人,即要求诗歌表达作诗者之志,这个“志”在精神上与古人相通。而明七子则是声称用古人之格调写自己的性情,但由于“格调优先”,直接呈现的却是古人格调下的古人性情,今人之情是否呈现无可考究,这是站在古人的立场看今人。立场的不同,说明了明七子与清人对诗人主体定位的巨大区别。

所以,性情,即诗人主体精神的内涵和表达,是解决唐宋诗之争的有效途径之一。师古,在明七子那里纯粹指向格调,而在清人这里,是格调与性情,即性情是什么,及性情如何表现。性情抒发如何能在古之格调下优游不迫,随心所欲不逾矩。由于均与古有关,所以便与温柔敦厚相关,与穷而后工相关,与正变源流相关。

于是,清代唐宋诗之争背后的诗学核心观念,就可以归结为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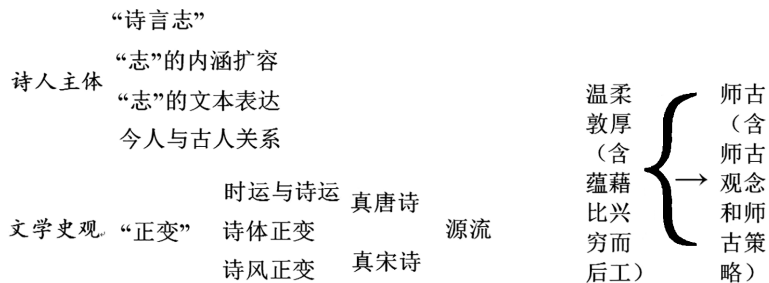
诗人主体,是从清初开始大量讨论的诗言志入手,中间经历了“志”的内涵扩容,“志”的文本表达,以及今人与古人关系,一直延续到唐宋诗之争结束的袁枚“性灵”,都是与诗人主体有关。

文学史观就比较复杂,首先指向的是正变观念,诗歌运会与时代关联的古老命题,以及诗体、诗风变化的价值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宋诗的特征概括和价值判断,同时还有对唐诗价值的重新确立,由此又关联源流论、蕴藉和发露的特征及价值的定位。诗歌史视野早已超越了或唐或宋。

其中又着重关涉到温柔敦厚(含蕴藉、比兴),这个包含着诗人主体之志、诗歌理想、具体表达方式的综合概念,也是杜诗是否能成为审美理想、宋诗是否能进入文学史的关捩。与之相关的便是指向诗人境遇与诗歌价值的穷而后工。

随着清人对这些观念的讨论深入,便可以解决诗歌创作是否具有相对自由的问题,即为何作诗,在什么程度上作诗。这就是师古有关的问题。

清代唐宋诗之争主要理论问题之逻辑关系如下:



而清人对这些传统诗学概念的考量不是单独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关注其历史演变,以及各个诗学概念之间的关联,如对同一个人的诗歌价值进行辨体分论(如杜甫),是否肢解了“诗有本”的整体统一性,这又与“正变”观念的认知有关;又如温柔敦厚究竟是更强调其呈现“性情之正”,还是更强调作为表达方式的“比兴”;杜甫的“铺陈排比”究竟是“连城璧”还是“砭砭”……清人由此解决“宋无诗”的问题,解决“唐无古诗而有其古诗”的问题,解决“变”的价值,即唐宋诗关系的问题,解决“诗必盛唐”的问题,最终解决唐宋诗之争的问题。

三、传统诗学核心概念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以温柔敦厚为例

清人在处理诗学观念与诗歌史事实有出入甚至是矛盾的问题时,往往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对诗歌史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使其被规范入诗学观念中;

第二种则是将诗学观念进行重新阐释,使其符合诗歌史发展事实。

第二种思路,其实包括了对内涵的重新阐释和价值的重新判定。内涵的重新阐释即昭示了清人修

正传统观念的勇气;但价值的重定却并不一定是建立在内涵重释的基础上,即:可以认同核心诗学概念的传统内涵,而对其在整个诗学体系中的价值进行重新判定。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有趣的是,几乎唐宋诗之争关涉到的每一个传统诗学核心概念,都经历了这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事实上指涉了思考的深浅。如宋诗的审美特征和价值的确立过程,非常清楚地展现了人们在这两种思路上的尝试:先是对宋诗的特征进行重新定位,不断置换宋诗的代表;随着整个唐宋诗之争对诗学观念重新阐释的推进,清人对宋诗的认知事实上又回到了原点:回到最初由张戒、严羽确立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特征上,只不过由于诗学观念的改变,价值判断也出现了反转。

在清人回溯并强调的传统核心诗学观念中,温柔敦厚是个比较特殊的案例。虽然和诗言志等概念有一样的历史深刻性,但是人们对温柔敦厚的讨论,无法像对诗言志一样,着重强调回归,并与当下现实结合,扩大内涵,寻绎更合适的表现方式等。主要原因在于温柔敦厚对唐宋诗产生了直接的束缚:从追求“颜色温润,情性和柔”的温柔敦厚审美理想来说,后代更多以“蕴藉”替换。那么在审美价值上,“唐诗蕴藉,宋诗发露”的分别,似乎又可以等同于唐诗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宋诗则不符合。这可能是唯一一个可明确分唐界宋的传统诗学核心概念。但正是这个概念本身,却在传统诗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理想,在具体阐释中给清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困境。

温柔敦厚作为《礼记》等系列经典确立下来的诗教观,一直是中国诗学的推尊和归依。这个命题之所以一直被延续,正在于其体现了文学、人生、政治理想的高度合一,涉及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精神体验和表达等各个方面,也体现了诗歌(文学)价值的理想状态:人格的要求与政治的要求,文学表达与政治讽谏,都是异质同构的关系,用温柔敦厚一语便可涵尽士人生命的全部。审美表现,也是士人涵养之外露。文学,正因实现了士人的人格及政治理想而得以不朽。

由于先秦两汉《诗》的特殊地位和政治性阐释,温柔敦厚这个概念完美地体现了先人的治世理想。即使是审美趣味一方面,也自带了表现内容、表现方式及表现效果。温柔敦厚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正因为如此,才能传承千年。但是,在汉末以后,温柔敦厚诗教观的诗学困境逐渐显露:一方面,作为讲究守正的中国思想文化来说,诗教观自不可废;而另一方面,由于诗言志和比兴发生了变化,三者形成的诗学思想体系,已经不再能够完全涵盖后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于是后人在用温柔敦厚来讨论具体的诗歌篇目时,往往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温柔敦厚虽然时常仍被作为人格和政治理想的说辞,其实更多是理想的口号而已。不过尽管可操作性十分有限,作为精神留存的温柔敦厚,由于变成一种最高一级的审美追求,多出现于对诗人诗作的终极评价中。

温柔敦厚的理论桎梏在杜甫身上显得尤其突出。杜甫“一饭不忘君”“致君尧舜上”,都是清初需要提倡的道德范本,但是由于杜诗的直陈,对赋的大量使用,以及被唤为“诗史”的对历史细节的呈现,便无法用严格意义上的“蕴藉”来评价杜诗。那么,杜诗究竟是否符合温柔敦厚?如果杜甫的诗连诗教观都不符合,那么其诗歌价值还能不能成为与六经并立的第一义?这是清人们在处理杜诗的时候经常发出的疑惑。若仅以温柔敦厚作为诗歌分析的依据,显然不符合清人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温柔敦厚作为诗教观,其无上的地位,与其对诗歌史的适用性产生了矛盾,昭示着儒家诗学观念内部存在矛盾。

对于蕴藉是否作为唯一符合诗教的审美特征,直接关系到真唐诗,以及宋诗审美价值的论断,自然也关联到正变源流及师古的问题。上文已经分析清人在处理诗学观念与诗歌史事实有出入甚至是矛盾的时候存在两种思路:或对诗歌史的价值进行重新定位,或将诗学观念进行重新阐释。在叶燮之前,人们都是小心翼翼地讨论温柔敦厚,特别是在面临个人处境与时代运会的时候,因为这关涉到政治态度。叶燮之后,人们才大胆地将“重新阐释”的眼光瞄向温柔敦厚。在重释温柔敦厚方面,清人又有三条阐释途径:一是改变温柔敦厚的内涵,以叶燮、沈德潜为代表。叶燮将温柔敦厚划入“体”,言辞表达为“用”的思路,改变了温柔敦厚内涵的同时,也稀释了其作为诗教观的经典意义;二是在保留传统内涵的同时,将温柔敦厚拉下神坛,代表为袁枚;三是将蕴藉的内容限定在“理”的层面,只要“理不外露”即为

温柔敦厚,这显然给了诗歌阐释最大的适用性,代表为翁方纲。

四、结语

清代唐宋诗之争所关涉的诸如诗言志、性情、温柔敦厚、穷而后工等等,实际上都与人对诗歌表现力的认识有关,对诗歌的功能有关,基于一致的“诗如其人”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人”本身的要求,以及人与诗歌的生命关联性。简单来说,如何认识“诗”,便是如何认识“人”;认为“诗”当如何,即认为“人”当如何。乃至看似只针对文学史的“变”“工拙”等问题,也投射出这些因素。诗人们是用诗歌展示自身的处境和对处境的情感以及判断,其实诗学家们也都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身的处境和对处境的认知。不同的是,诗人通过作诗,而诗学家通过论诗。而后者由于论述的完整,显得更全面,也更能展示清代文人思想的界限。即便是看似与道德、政教、人格修养最远的袁枚,却持论最深刻、通达的人生体验。

[参 考 文 献]

- [1] 吴乔. 围炉诗话[M]//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第2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2] 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诗辨[M]. 郭绍虞,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3] 叶燮. 原诗笺注[M]. 蒋寅,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4] 周裕锴. 《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J]. 文学遗产,2010(2):28-37.
- [5] 王士禛. 唐贤三昧集序[M]//王士禛,选. 周兴陆,辑. 唐贤三昧集汇评:前附.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6] 李梦阳. 空同集:卷五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7] 黄与坚. 论学三说·诗说[M]//张寅彭. 清诗话三编:第1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8] 冯班. 钝吟全集·钝吟文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Study on Main Theoretical Issues and Logical Process of the Dispute on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Tang Yunyu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t was a discussion about main theoretical issues, including poetic essence, poetry and writers, poetic function, the changes of poetry and poetry criticism, instead of specific poetic methods. The dispute focused on Du Fu's poems, notes on poets and *poetry Cang Lang* by Yan Yu, Song poetry and the Jingling school. Therefore,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is by no means a simple question of mentoring strategy, bu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poetics, just like poem expressing ideal, orthodoxy of temperament, classical poetic formal distinctions, the blandness, orthodoxy or heterodoxy, imitation or change, learning, exposition, comparison and affective image, and so on. These concepts can be constructed log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oet subject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is the typical case that the dilemma and settlement of orthodoxy of temperament.

Keywords: the dispute on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poet subject; orthodoxy of temperament

[责任编辑:陈忻]